

2003年
上海社会发展蓝皮书

主编 尹继佐

提高城市的 生活质量

A Social Development Bluebook of Shanghai, 2003

Improving the Urban Quality of Life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602

D668
Y56

2003年 上海社会发展蓝皮书 提高城市的 生活质量

主编 尹继佐

副主编 卢汉龙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伊里 业露华 刘 华 孙克勤
张鹤年 杨 雄 陈振民 周锦尉
姚仲华 柴俊勇 郭奕凯 潘大渭
戴律国

A Social Development Bluebook of Shanghai, 2003

Improving the Urban Quality of Life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提高城市的生活质量: 2003 年上海社会发展蓝皮书/
尹继佐主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ISBN 7-80681-125-7

I. 提... II. 尹... III. ①社会发展-社会分析-
上海市-2002②社会预测-上海市-2003 IV. 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0655 号

书 名: 提高城市的生活质量

——2003 年上海社会发展蓝皮书

主 编: 尹继佐

责任编辑: 杨 国

封面设计: 姜 明

电脑制作: 王培琴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online.sh.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5.25

插 页: 4

字 数: 316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

ISBN 7-80681-125-7/C·002 定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导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	1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2
二、第一关注点: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8
三、第二关注点:心理健康与幸福感	20
四、第三关注点:公益性反馈行为	24
五、制度设置与社区质量	27

第一部分 殷实小康的市民生活

市民家庭生活质量的微观分析	43
一、殷实小康的家庭生活	44
二、提升家庭生活需注入更多人文关怀	56
殷实小康的生活消费	66
一、居民消费变化的特征	67
二、新一轮的居民消费热点	74
住房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78
一、居住条件明显改善	79
二、新世纪居住质量更上一层楼	82
三、住宅发展战略与政策	85

提高城市的生活质量

上海就业与职业生活质量	92
一、就业状况发生深刻变化	93
二、劳动关系日益市场化、法制化	96
三、劳动收入与社会保障	99
四、民主参与和职业培训	103
五、职业安全与劳动卫生	106

第二部分 追求美好生活 共享社会进步

社会结构、收入不平等和生活质量	111
一、现有经济收入的形成机制和差距	113
二、影响收入结构的因素	117
三、不同社会阶层的工作和生活质量	123
弱势群体与城市贫困	132
一、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133
二、帮困救济 社会有责	137
弱势青少年的扶助与支持	149
一、问题与现状	150
二、政府救助与社会支持	165
心理健康问题及其调适：以青少年为例	172
一、全国和上海的枚举资料	173
二、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社会成因分析	175
三、成功的经验和应对的策略	180
老龄化社会与上海老年生活质量	193
一、上海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特点	194
二、上海社会经济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	198
三、全面提高上海老年人群的生活质量	200
上海流动人口生活质量分析	207
一、上海流动人口规模的发展过程及其基本特征	208

二、流动人口的收入与支出分析	213
三、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与生活质量的关系分析	217
四、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分析的基本结论	226
社会越轨行为:毒品滥用	228
一、日益严峻的毒品态势	229
二、毒品亚文化的新特点	233
三、特别关注:对青少年禁毒教育的反思	238

第三部分 社会制度与组织的重建

呼唤教育制度的创新	247
一、教育对于生活质量决定性的影响与作用	248
二、上海教育的回应及其进一步的创新建议	259
提高全民素质的基础性工程	267
一、上海加强市民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经验	268
二、进一步加强上海市民道德建设的建议	274
依法治市和公民法律素质	279
一、依法治市的探索和实践	280
二、为公民安居乐业提供法律保障	285
社会转型中的宗教问题	293
一、以经济交流形式开展的宗教传播活动	294
二、宗教社会功能之新变化与再认识	296
三、境外来沪新居民群落中的宗教生活需求	298

第四部分 提高生活质量的政策建议

发展市场经济 弘扬人文精神	311
一、发展市场经济 改善生活质量	312
二、市场带来新的生活质量问题	313
三、弘扬人文精神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	316

提高城市的生活质量

四、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318
就业、保障与人的自我实现	321
一、“促进就业”作为基本的社会经济政策	322
二、社会保障制度也要可稳定持续发展	327
三、创造自我实现的舞台	331
打造社会安全网,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334
一、社会安全网的内涵及其发展	335
二、完善社会安全网的主要建议	337
培养公民精神 推进社区治理	344
一、上海城市社区建设的进展与主要经验	345
二、社区共同体的形成与社区治理	347
三、继续推进社区治理	352
推进科学和谐的生活方式	357
一、深化环境治理,加强食品监察	358
二、推广科学生活,普及运动锻炼	362
三、改变生活理念,学习自我保健	364
附录一 上海社会发展主要指标(2000 ~ 2001)	368
附录二 中国四个直辖市社会发展指标比较(2000 ~ 2001) ...	370
附录三 世界社会发展指标比较	376
后记	380

导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

〔内容提要〕 本报告分析探讨上海在新的发展时期里的生活质量问题。导论的报告根据上海全面进入小康生活水平的社会进步的要求,提出应当用全球的眼光、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和处于经济中等发达程度的水平来衡量上海城市生活的质量好坏。报告归纳了在总体达到小康生活条件下衡量生活质量的三个方面关注点:即人们对生活各个层面的满意程度、市民的心理健康与幸福感,以及对社会的公益性反馈行为,并依次对上海近年的社会发展作了分析概述。报告同时关注了和生活质量有关的宏观层面的制度设置与社区质量的问题。对当前社会的教育、道德、法律、宗教等四大社会制度的设置状况做了总结评判,并对决策的关注面提出研究建议。报告认为,从关注经济指标到关注社会指标是衡量人类发展的一个深入,而关注社会指标中的人文发展指标更是评价生活质量的最重要的内容。

提高城市的生活质量

上海在经过连续十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之后,社会与人文面貌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全面地来评估发展和衡量社会的进步已成为一个众所关注的问题。本年度的社会发展报告以提高城市的生活质量为主题,其基本出发点是:在经济发展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更有必要认真审视经济发展的社会价值究竟在哪里?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对生活质量的关心正是在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基础上的自然结果,许多与生活质量有关的问题恰恰也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同步出现的。因而对生活质量问题关心是对发展的关心,也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怀。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根据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思想,提出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的最初 10 到 20 年里,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又指出,要尽快使全国人民都过上殷实的小康生活,并不断向更高水平前进。要坚持贯彻党的富民政策,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努力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不断改善人们的吃、穿、住、行、用的条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提高生活质量。^① 他同时也强调,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尺度。我们在 2000 年的社会发展报告《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中曾经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 50 年里,国际社会对“发展”的理

^①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 年 7 月 1 日),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7 月版,第 43 页。

论认识过程。归纳为经历了从“经济增长论”到“需求满足论”,进而到“素质提高论”的三大发展观之间的重要转变。^① 这些发展观的转变来自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体现为追求“以物为中心”的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的意识形态重建。同时当代发展观在对“以人为中心”发展的理解上,也已经从单纯的以满足一代人的生活需求,进而深入到关心人类千秋万代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这种认识论与思想方法上的深化是以当代的发展经验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全面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尺度的正确性。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能够不断地与时俱进的。

我们在 2002 年的社会发展报告《城市管理与市民素质》的《导论》中认为,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关于对“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阐发充分体现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治国纲领”。这和他近年来反复强调的党要实现“三个代表”要求的“治党纲领”同样具有发展与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历史性意义^②。江泽民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③

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必然需要对人民的现实生活有更为深入实在的把握,必须以人为本地来谋求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建国以来最快、最大的改善。日新

① 尹继佐主编、卢汉龙副主编《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 2 月版,第 301 页。

② 尹继佐主编、卢汉龙副主编《城市管理与市民素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 1 月版,第 7 页。

③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 年 7 月 1 日),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7 月版,第 44 页。

提高城市的生活质量

月异的改变使民众的生活要求和生活目标也同时发生着变化。当经济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即如小康中等程度以后,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便突现了出来。生活质量是对人民生活的全面性评价,也就是对生活本身究竟是好是坏的评估。它不仅涉及到人民实际的生活水平状况,比如吃什么,用什么,玩什么?而且也和人们的人文观念和评价标准有关,比如想什么,要什么,做什么?因此,它体现了人要实现全面发展的思想。从世界各国对生活质量的关心和研究来看,生活质量已经是现代社会追求的一个现实目标,生活质量的评价成为社会发展评价的核心内容。比如,在世界银行每年发表的发展报告中,专门列出的评估生活质量的指标包括以下7个指标:(1)人均私人消费增长率;(2)儿童营养不良状况占5岁以下儿童的百分比;(3)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4)出生时的期望寿命;(5)成年文盲率(文盲占15岁以上人口的百分比);(6)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7)城市地区获得环卫设施服务的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百分比。显然,这已经不是以衡量经济生活水平为主而是以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为主的。

如果以一般经济、社会和人文三大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估,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程正是处于迅速成长的工业化社会前期,在世界上处于温饱型社会的发展阶段。上海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便已进入小康生活水平社会发展阶段。按照国家统计局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制定的小康发展指标来衡量,上海均已实现小康的目标。上海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世纪初叶时期,需要在建设一个殷实小康的道路上积累起新经验,形成一种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联合国从1990年开始用一个简单的综合指数来测量基本的人类发展的平均成就,被称为人类发展指数(HDI)^①,并且每年出

^① HDI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也可翻译为“人文发展指数”。

具《人类发展报告》评估各国的人类发展状况。人类发展指数以一个国家和地区居民的寿命(出生时预期寿命)、知识(2/3 权重的成人识字率和 1/3 权重的小学、中学、大学综合总入学率)、体面的生活水平(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三个方面的成就来体现,至今已经发展和建立了几个综合指数来衡量人类发展的不同方面。比如,考虑到男女之间成就的不平等,制定了性别发展指数(GDI),将不同性别的人类发展指数分开计算,以比较其间的差别;又制定了性别赋权尺度(GEM),以衡量在经济和政治机遇上的性别不平等;在 1997 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又引进了“人类贫困”的概念,制定了人类贫困指数(HPI)等等。联合国的人类贫困指数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它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贫困指数标准分开比较。二是增加了以“参与或被排除”的衡量纬度。人类贫困指数在寿命比较方面,发展中国家是计算出生时预期活不到 40 岁的概率;而发达国家则是计算出生时预期寿命达不到 60 岁的概率。在知识方面比较的指标也有不同,发展中国家是衡量“成人文盲率”,而发达国家则是衡量“成人功能性文盲率”^①。在衡量“体面生活水平”的经济收入指标方面,发展中国家衡量贫困的指标是“无法获得安全用水的人口百分比”、“无法获得卫生保健服务的人口百分比”和“五岁以下体重不足的儿童所占百分比”三项,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经济贫困指标则是“生活在收入贫困线以下的人所占百分比”^②。同时在衡量发达国家的贫困现象时,联合国在保留从寿命、知识、体面生活水平(收入)这三个纬度以外,又增加了一条衡量贫困的纬度——那就是

① “功能性文盲率”是根据《国际成人识字情况调查》的识字等级来衡量,16 至 65 岁的成年人口中得分达到第一级的人数百分比。参见联合国开发署 2001 年人类发展报告《让新技术为人类发展服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版,第 135 页。

② 在发达国家,收入贫困线已经不是采取绝对贫困的标准(俗称菜篮子标准)来衡量,而是一般以全社会家庭可支配收入平均值的一半划为贫困线。收入低于这个标准的被认为是贫困人群。

“参与或被排除”。使用的指标是“长期失业率”(指12个月及以上找不到工作的失业)。也就是说,本人无法改变的长时期失业被认为是参与和被排除方面出现了问题,是一种“贫困”现象。显然,这种贫困除了表现为经济收入的贫困以外,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贫困的现象。上海作为一个现代化程度和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大城市,如果套用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系统来衡量是可以列入发达社会行列的。联合国标准是将人类发展指数在0.8以上的列为高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处于0.5和0.79之间的为中等发展水平,低于0.5的为低发展水平国家。在20世纪末,中国平均计算的人类发展指数达到0.718(1999年数据,下同),正处于和全球平均值不相上下(0.716)的可喜地位。中国一直是社会指标优于经济指标的国家。而上海的人类发展指数更高,达到了0.852(2001年),和中国特别行政区香港相仿,是全国内地城市中唯一达到0.8以上发达水准的地区。所以需要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在衡量上海的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状况时,不能躺在已有的业绩水准上,而有必要采用发达社会的人类发展指标体系的标准。

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体系综合评估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它体现着一个基本的思想是经济增长是实现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它同时贯穿了这样的发展价值观:人们的需求满足应当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以人的素质进步为重要保证。就此而言,综合性的业绩评估固然重要,具体的结构性评估更是不能忽略。一个国家和地区在造成健康、知识、体面的生活和平等参与的过程是如何得以实现的,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而且这对于观察、预测和决策层面来讲是更为重要的考量思路。

在上世纪末的“九五”计划期间,上海已经把“以人中心”列为社会发展的规划目标。在实践中也开始认识到,“以人中心”

的发展不但是指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同时也包括了必须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本世纪进入“十五”计划发展时期,上海继续坚持这一正确的发展理念。把追求有质量的发展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检讨发展的思路:不断地追求经济发展的质量,社会发展的质量,以及人的发展的质量。其中,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最终都会落脚在“生活”领域。也就是说,提高经济运行质量、提高生活质量、提高市民质量是我们在“十五”时期寻求发展的总基调。上海不能单纯满足于综合性指标的排位,而需要更为深入地了解具体的发展对城市居民的生活究竟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对城市生活质量的关注已有相当的时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围绕着社会指标的研究,上海率先开展有关生活质量评估的社会调查研究。并且将社会指标作为评估社会发展的外部客观条件,将微观的生活质量评估作为衡量发展的内部主观结果。并且用20世纪80年代末在上海所做的生活质量调查数据提出将社会指标和生活质量研究结合起来评估发展的结构模型^①。建立这个模型的指导思想是,不是所有的社会统计都对发展的评估有直接的意义。只有那些对生活质量的的好坏有明显贡献意义的指标才是最值得关心的部分。这个模型提出了生活质量的评价包括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在微观层面,生活质量的评价包括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满意程度、精神健康与幸福感、对社会的反馈与公益行为。在宏观层面,它包括了组织与制度对社区的认同与辐射,社区凝聚力与组织制度的协调,社团与集体行为等。本报告的研究使用了这个理论框架,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从认知、情感、行为三个层面来分析评估上海市民的生活质量。

^① 有关这个模型的研究可参见林南、卢汉龙《社会指标和生活质量结构模型探讨》,《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二、第一关注点：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人类有关生活质量的话题最初起源于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未必带来人们对生活的满意。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在对三十多个州的调查中曾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是高的州,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却反而是越低。如此带来的问题便是如果经济发展的结果带来的是人们对生活满足感的降低,那么发展的意义究竟又何在呢?这正应对了美国学者布尔加斯在 1958 年所提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注意“生活质量”的问题。因此在市民生活质量的评估分析中,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满意程度被认为是一个基本的评价结果。

人们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满意程度是人们在对自己的生活应该如何和实际如何的一个认知的结果,因此被理解为是认知层面上的生活质量评价。一般来讲,当人们被问到他/她对自己各个方面的生活是否满意时,他们均会对自己眼下的情况和过去或是周围的人情况加以比较,然后得出一个判断。所以满意度回答可以认为是个人理性认识的判断结果。国际上对于生活满意程度的研究曾得出过一些有意义的结论:(1)在生活的所有各个方面,各国对家庭生活的满意度一般都是最高的,而对于经济收入的满意度一般又是较低的。(2)在一个足够的人群里,人们的满意程度高低一般呈正态分布。这也就是说,任何社会在任何时间里,总是有一部分人对生活比较特别满意,而又有另一部分人却对生活特别不满意。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分析的意义就在于发现哪些人是处于满意度两极的?他们为什么会是这样?同时,(3)对于经济发展与满意度关系的问题,经济高速增长容易产生生活满意度反而下降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其一,对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求是没有止境的,并且会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而提高;其二,经济高速增长意味着利益结构也在激烈变动之中,容易产生认知上的滞后。

由于经济发展的原则和社会的原则是有不同的。市场经济制度在取得资源配置优化和效率最大化的同时会带来分配结果上的不平等。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会出现“富裕社会里的贫穷”。而在中国,又正处于经济制度和产业结构双重转移过程之中,急剧变动的生活形态使人们对生活的判断充满着矛盾。上海的生活质量调查研究也同样得出过类似的结论。本报告将从一些主要的生活层面来观察分析上海市民所认知的生活质量。

(一) 对家庭与人际关系的满意度始终领先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也是一个对生活十分重要的社会支持力量。在中国人文传统里,小康社会“天下为家”。改革开放首先在意识形态上采取了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和政治方针,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得到重新确认。邓小平提出小康发展战略思想更是唤起了广大群众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家庭的作用将会得到更大的发挥。对生活质量的研究表明,家庭生活的质量对生活质量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上海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生活质量调查研究就显示,和世界各地的研究相似,上海人在各项生活领域的满意度中,对家庭生活的满意程度也是最高的。至今这个结论未被事实改变。

在有关中国人社会的生活质量研究上又表明,在对生活的满意度方面,除了对家庭生活的满意为最高以外,对人际关系的满意度名列第二。这是和其他国家与地区比较不同的地方。中国人对人际关系的注重是不同于西方发达社会的。在中国人的社会里,家庭、单位、社区历来是三个主要的个人生活支持系统。家庭的功能恒久不变是长期文化使然。而且在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在 2002 年的社会发展报告中我们已经分析过上海在出现大批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社会的相对

稳定。其中有一个比较容易受到忽视的因素是家庭互助功能^①。大批 20 世纪 50 年代出生的所谓的“40 ~ 50 人员”^②,大多出生于多子女家庭,即有较多的兄弟姐妹,而且他们的一些子女目前也已长大成人。两代家庭成员在经济、信息、关系网、精神等各个方面都给予了良好的相互支持。大大消解了“下岗”带来的社会矛盾。这是在因经济转轨带来社会问题时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自保护能力的体现。又如,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上海家庭平均人口的人数减少,核心家庭的比例增加很快。尤其是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建设步伐加快以后,上海的住房窘迫现象得到缓解,子女和父母分开居住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但是父母和成年子女的关系以及祖孙三代关系依然保持传统的特征。在上海流行的购房计划中,有三居室的住房被认为是“到位”的置业计划(指三室一厅或三室两厅的房子)。三居室除了夫妇、子女(一般是独生子女)各用去一间以外,剩下的一间一般被认为是“客房”,而主要的客人便是“父母”。

由于经济制度的转变,原来的单位制度功能消减了,社区功能凸现。上海的单位 and 社区在市民支持系统里的作用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或者说出现了转位的现象。这在人际关系的变化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单位里同事之间亲密关系的程度降低了。个人遇到困难寻求单位同事帮助的现象减少了。我们在 2001 年的调查数据表明,在所有的工作同事中平均能说出名字的大约有 70 个人(71.19 人),但是能说是朋友的只有 7 人(6.61 人)。也就是说,

① 参见尹继佐主编、卢汉龙副主编《城市管理与市民素质》“序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 2 月版。

② 下岗人员中,许多是在共和国诞生初期出生的,目前大多为 40 ~ 50 岁,大量女性 40 多岁,男性 50 多岁的职工按照中国的职工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到退休年龄,但面临退出劳动就业人员行列的危机,所以各地均有所谓的“40 ~ 50 就业难”的问题。上海市政府针对此问题提出“4050 工程”计划,采取措施重点扶持此类人员再就业。